



栉风沐雨 砥砺前行

——记温岭乡贤、著名农业教育家莫惠栋

记者 刘振清

今年是台州农校从泽国丹崖山迁出70周年。1952年夏天，在丹崖山办学12年的台州农校，因诸多原因迁往黄岩九峰。从1940年春到1952年夏，台州农校在泽国丹崖山招收28个班级，毕业564人。

而在这些毕业生中，有一名学生从求学到工作，都给台州农校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前后11年间，这名学生和他父亲两人先后从台州农校毕业；1944年秋至1951年夏，这名学生在因病休学一学期后，先后从台州农校初农和高农毕业，后来成长为著名农业教育家、植物数量遗传学和生物统计学家。他就是出生在我市原塘下乡下王村的扬州大学农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莫惠栋。

莫惠栋以不知丹崖山在哪里、不知怎么报名参加考试等为由，说不要去。

但莫父已定了叫儿子考农校的主意，说：“不行，你必须去考。明天是报名最后一天，后天入学考试。你明天就去报名。”说着，莫父拿出一张写有七八个地名的小纸条，“明天早上，你带上小学五年级的成绩单和这张路条，一路问过去。找到台州农校，报名后到泽国镇上找家旅店住一晚，后天上午参加学校入学考试后回家。好好考。”

这时的莫惠栋还是一个距10周岁还差4个月的孩子，从未出过远门，更没有住过旅馆。他捶胸顿足，哭着说：“我不去！我不去！”

第二天，莫父催莫惠栋早早起床，吃过早饭后，把他送到半里路外，指着泽国方向说：“从这往前走，有路口不明的地方，向人讨问，路生在嘴上。”说完，莫父递给他两张纸币，“这钱你拿好了，在路上食宿用。”

“从县农林场到泽国丹崖山，一马平川，20多里地没有多少岔路，路上只问过几回，中午时分就到泽国了。”

莫惠栋在丹崖山找到台州农校，从“丹崖书院”门洞进入，是一个篮球场般大小的荷花池，池边摆放着数张石凳，被茂密的法国梧桐枝叶遮盖，凉风习习，化夏为秋。“风景之美是我从未见过的。”

在报名处前，因惧怕陌生人 and 不知道怎么报名，莫惠栋就坐在石凳上，傻傻地看着一批批同学走过。

“惠栋，你也去报名呀！怎么老坐这里？”傍晚时分，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莫惠栋耳边响起，“抬头一看，是老爸。我高兴坏了。爸没说什么，拉着我的手径直走到报名处，要了一张表格。在学业水平栏，他叫我填写‘小学五年级同等学历’。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同等学历’。报名处的一位老师看了我的五年级成绩单后，说‘还可以’。说完，给我一张盖有学校印章的号码纸，叫我第二天早上带着它参加入学考试。”

“考试只考国文和算术，各一张试卷。算术10道题，其中有几道六年级的题目。好在我在塘下小学读书时，五六年级同一个教室，上课时我‘偷听’了六年级的算术课，所以10道题目全都会。国文是写一篇《我的志愿》的作文。我从农业对农耕社会的重要性起笔，丰衣足食，必赖农耕。写上爷爷平常和我讲的‘不种田吃什么’等，接着写要种好田就要有知识有技术，要有农业知识就要到农校读书学习，以润泽桑梓，造福乡里。交卷后，我自觉文理通畅，忖度录取应该不成问题。”

当年报考台州农校，没有通知书之类文件。录取、入学都是学校在校门口张贴大布告示众。考试几天后，莫父叫莫惠栋到学校看“发榜”，嘱咐把重要的抄下来。“我报考的这一届是浙江省立台州农业职业学校初级农艺科第四届，正取40名，备取10名。我是正取第22名。布告告之‘新学期于民国33年（即1944年）9月4日开始报到，9月11日正式开学，新生入学必须带一把锄头等’。”

“三不合格”同学

到台农后，莫惠栋看到招生简章上写着报考台农三个基本条件，分别是小学毕业、年龄12周岁以上、体重不低于25公斤。“三个条件我都未达标，都不合格，但也从未被人检查过。”莫惠栋说，虽然他未读过小学六年级，但学业基本能够衔接，并未脱节。力不从心和困难的是“生产劳动”和“农事操作”两课。“因年纪轻，力气小，干活总是达不到带队老师的要求。”挖地的时候，别的同学挖完一畦了，他还只挖了一半。翻番薯藤时，其他同学翻完一垄，他只翻了半垄。“但老师很理解和体谅我年小体弱，每次记成绩时，都给我记60分，不让我不及格补课。

“在台农学习期间，对我打击最大的是疾病。”莫惠栋说，当时农校和农村差不多，也是缺医少药，不讲或者说不知道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结果入学不到两个月，莫惠栋就感染了疟疾。“当时，绝大多数同学都没有挂蚊帐，因此多数同学也都感染过疟疾。”

“影响我学习和健康的还有一个因子是虱子。”莫惠栋回忆说，当时，台农学生住的是大寝室，大通铺，十多人的床铺连在一起，只要其中一人生了虱子，其他同学就难逃。“一年级第二学期初期的一天，做早操时同学在我衣领上看到一只虱子。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虫子，非常吃惊。”过了两三个月，莫惠栋发现他内衣、内裤上都是虱子，裤缝的地方更多。莫惠栋说：“生虱子和感染疟疾不一样，感染疟疾是被传染的，生虱子是个人卫生没搞好产生的，很没面子。我不敢声张。”他想了一个对付办法，每隔一周左右，一个人悄悄来到后山的八德亭，看看四周没人，就快速脱下内衣内裤，用力甩抖。虱子落地，立即被他踩死。“这方法效果还蛮好的，虽然虱子未全部消灭，但数量得到有效控制。”

然而，在疾病和虱子的多重困扰下，莫惠栋病倒了。



2019年，莫惠栋获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1945年放暑假前的一天下午，莫惠栋和同学们参加劳动课。这天的任务是到泽国米厂，背一袋25公斤重的大米到学校。“这袋米的重量相当于我的体重。当我汗流浹背把它背回学校时，感到浑身无力，瘫倒在地。”莫惠栋说，同学们赶紧把他扶回寝室。他倒头就睡，醒来时已是晚上9点多，他全身发烫酸痛，无力起床。老师赶紧过来看望，叫他躺着少动，并指定班长林皋模照顾他。4天后放暑假了，林皋模一路护送陪伴他回家。莫惠栋说：“全程30多里，几乎都是他背着我走，直到见到我爷爷奶奶。”因受疾病和体弱困扰，考虑到学校没有治疗条件等，莫惠栋留在家里康复休养，请假休学一个学期。

先工作后毕业

1947年冬，莫惠栋从台州农校初农艺五届毕业，并于次年9月考入台高农48秋季班。

新学期开学后，莫惠栋看到班上同学大多是台初农1947年冬和1948年夏毕业的同学和校友。“当时，我们班应该有40多人。”但到1949年9月10日，温岭解放后新学期开学的时候，莫惠栋感到很吃惊：同学数量大幅度减少。他所在的高农48秋季班同学，从原来的40多人突然减少到6人；高农49春季班也从原先的四五十人降到9人。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台农学生读书风气大大改进，晚上也普遍有晚自习了。

“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班上6名同学读书都非常用功，大家都感到读书的时间不多了。但并不知道机会比预料来得更早。”莫惠栋说，1951年3月上旬，浙江省人民政府农林厅发布征召令到台农，其中一项是“紧急征召熟悉棉麻生产技术人员”。莫惠栋和同学们积极响应号召，3月10日早上，班上6名同学悄悄离开学校，步行到路桥，经临海转车，当天晚上赶到杭州省农林厅，次日就被分配到萧山等地从事棉花和麻类新品种推广和技术指导工作。

1951年6月下旬，莫惠栋等6名同学接到省教育厅和农林厅给他们的联合通知，叫他们6月30日前返回台农，参加7月5日的毕业考试，考试完后再回原岗位，来回路费由省农林厅报销。

回到泽国丹崖山后，校领导对他们说，莫惠栋他们“集体脱学就业”后，使他们这班学生全班缺失，无人毕业。学校请示省教育厅，教育厅和农林厅研究后，发文通知莫惠栋他们先返校考试，考试通过后学校发毕业证书。

因为这段“插曲”，所以莫惠栋等6名同学的履历是1951年3月参加工作，而台农毕业时间是1951年7月，出现先工作后毕业的罕见履历。

在省政府农林厅特产局和慈溪县棉麻技术指导站工作两年半后，1953年全国大学统一招生，莫惠栋“保送报考”被南京工学院建筑系录取。出于对农业的眷恋，他三番五次要求转读农学。同年底，经全国招生委员会批准转入苏北农学院农学系。在校期间，他成绩优异，年年被评为优秀生，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毕业留校，主攻试验统计和植物遗传育种，先后任苏北农学院、江苏农学院（后称扬州大学农学院）作物遗传育种教研室、试验统计教研室、数量遗传研究室主任，1983年被评为教授，1990年任博士生导师。由于教学和科研成果突出，莫惠栋先后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甲类一等奖、农业部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江苏省劳动模范等褒奖；1989年国务院授予他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2019年获赠中共中央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2021年获赠中共中央颁发的“光荣在党50周年”纪念章。

秘密加入新青团

莫惠栋说，虽然他离开丹崖山台州农校70多年了，但学校的一草一木和老师的音容笑貌、谈吐言句，至今仍然铭刻于心。回忆起老师，和其他同学

一样，吴理初老师是莫惠栋掌握专业知识、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老师，也是印象最深的老师。

1949年5月15日，因“时局不稳”，台州农校比往年提早一个半月放暑假。放假这天，吴理初找到莫惠栋，问他能否留校几天，“帮忙做些张贴标语等宣传工作。”莫惠栋说，当时他已笃信共产党必胜，巴不得为革命做点什么，就非常爽快地答应了。

过了几天，吴理初叫来蔡诚和同学，和莫惠栋搭档，说：“你俩白天先出去探探路，看哪些地方可以贴标语，等晚上人少的时候再出去贴，尽量做到不让人知道。被人看到了也不要怕，你们戴上校徽，大胆承认自己是台农学生，相信不会把你们怎么样的。”说完，吴老师教他们快速张贴标语的方法：一人弯下腰，握住标语两角，反面向上置于背上，另一人往标语反面涂抹浆糊。然后，前者起身往墙壁上一靠，标语就张贴好了。5月20日和25日晚上，莫惠栋、蔡诚和两次上街张贴“共产党万岁”“解放军万岁”等标语，“非常顺利，两次都没有被外人发现。”

吴理初还是莫惠栋的入团介绍人。1950年1月20日前后的一天，吴理初找到莫惠栋，说他立场坚定，思想进步，经过考验（指上街张贴宣传标语），学习成绩好，但年龄不到，不能参加共产党，问他是否愿意加入新青团，以后再入党。莫惠栋肯定回答后，吴理初拿出一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登记表》，叫莫惠栋填写。填好后，吴理初说：“我算你的人团介绍人，过几天我们一起去办手续。”

同月30日，吴理初带莫惠栋到泽国镇一座临街的小木屋楼上，拿出一面党旗钉在墙壁上，和莫惠栋一起，举起握拳的右手进行入团宣誓。宣誓后，吴理初握紧莫惠栋双手说：“祝贺你，从今天起，你就是中国新青团团员了。”莫惠栋回忆说：“当时，党团组织和成员都是保密的，我入团后也没过组织生活，直到1951年3月到省政府农林厅报到要转团组织关系时，才知道我们班上6名同学有4人加入新青团，介绍人都是吴老师，而我们彼此一点也不知道。”



莫惠栋的浙江省立台州农业技术学校学生证。



1987年6月，莫惠栋在第二届国际数量遗传学会议上作报告。

（本版图片均由莫惠栋先生提供）

六岁儿童直接读二年级

莫惠栋老家在新河镇下王村一个叫“四份头”的自然村。“四份头”是四户人家之意，莫惠栋的祖父莫经涵是其中一家。莫经涵初识文字，解放初时担任下王村第一任村长。

莫惠栋的父亲莫向荣是莫家唯一的一个儿子，他小学毕业后，其父希望他回家务农，但他却坚持要读完高中，说：“没有学费我自己去挣。”

为此，莫向荣在祠堂出钱办的识字班（也叫短期小学）里教学，用教书所得的钱报考临海回浦中学。读初中期间，“在爷爷的操持下，父亲和母亲张始流结婚，并于1934年12月28日生下我。”莫惠栋说，“父母先后养育了六子二女共8个孩子，我排行老大。1937年，父亲考入刚刚创办的浙江省台属六县联立高级中学（台州农校的前身）。1940年，父亲从已经搬迁到泽国的台州联高毕业，这时，我7岁了。”

“我出生的时候，家里亲戚和村里邻居，都没有和我年龄相近的小伙伴，我的童年属于‘玩伴空窗期’，没有像别的小孩那样跌打滚爬。童年期间，我接触的都是大人，我要做的事情也是大人们希望我做、而又超出我这个年龄孩子的事。”莫惠栋回忆说，占据他童年大多时光的是识字、写字和读书。“大概在我4岁的时候，妈妈就开始教我认字，记得最先认的是上、大、人、手、足、天……用的是油印的短期小学《识字课本》。妈妈上过两期短期小学，教我识字启蒙，绰绰有余。”因为是母亲教他识字，莫惠栋对识字并不反感，反而感到很亲切。大约一年时间，莫惠栋能读会写1000多字，还通读了父亲给他买来的《小朋友》读物。第二年，莫父从台州联高抄来杜牧的《阿房宫赋》，叫他熟读背诵。

1940年9月，新学期开学，莫母带莫惠栋到塘下小学报名。

在报名处，老师问“几岁啊”“认识多少字啊”等。“当时我没接触过多少外人，在陌生人面前有些胆怯害羞，不敢大声说话。”莫惠栋说：“是我妈替我回答的。她告诉老师，说我认识六七百字。其实当时我认识1000多字了。”说完，老师拿来一本书，叫莫惠栋念了几段，又叫他写了名字等几个字。看莫惠栋识字不少，特许这个不到6周岁的小孩跟读二年级。

幼学之年报考农校

1944年夏天，莫惠栋念到小学五年级，离小学毕业还有一年。这年8月下旬的一天晚上，莫父和莫惠栋说：“惠栋，我读的联高，现改名叫台州农校，设初农和高农两部，初农相当于初中。你去考考看怎么样？在农校读书不要钱还免费吃饭。我们农林场（莫父这时在位于横峰的温岭县农林场工作）离农校丹崖山又近，方便你上学。”



莫惠栋先生在书房看书。